

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李 新 陈铁健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 国民政府对日政略的变化●国防建设与整军备战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抗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政局●卢沟桥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淞沪会战●平



津沦陷后的华北战局●八路军三大主力挺进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国民

政府迁都重庆与南京陷落●新四军

奔赴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抗战初期中国的内政外交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陶德曼调停●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与首届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

六届六中全会 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

1937—1938

本卷主编 李良志 王树荫 秦英君

编著者 (按章节为序)

马振犊 岳 梁 王树荫

秦英君 杨兆平 李东明

王 炎 姚宏亮 翁有为

郑 颖 丛培英 席富群

宋金寿 李玉荣 王海光

上海 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陆宗寅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

1937—1938

本卷主编 李良志 王树荫 秦英君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编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联合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25 插页 4 字数 422,000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8-02024-8/D·397

定价 28.00 元

序 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院长胡乔木同志的倡议,我们从1978年8月起,开始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多卷本)一书。乔木同志建议我们的书写成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并要求我们以《苏联国内战争史》作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的中文版只见到第二卷,即写十月革命的那一卷。时间是1917年10月至11月,只约两个月左右。内容包括了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的爆发和胜利,以及全俄各地对十月革命的响应和胜利。材料来源很多,既引用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档案,各种文件和记录,又引用了许多当事者的亲历记和有关人的回忆录,而把报刊记载只作为补充——并不以它为主要资料。这本书内容翔实,叙述生动,长达50余万言。后来苏联有关十月革命的许多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都把它所记载的资料作为重要的依据。在中国,写成一部类似的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很有必要,很有用处。但是困难很大。首先是档案不全,其次是亲历记和回忆录不多,尤其是革命领导人,很少发表过系统的亲历记、回忆录之类的文章和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30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实在太多,要写得像《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详尽丰满,不知道要多少卷帙!我们经过反复地讨论研究,准备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写成13卷、600万字左右的历史书。它是历史长编性的,所以材料要丰

富,准确。凡是材料不足、问题还不清楚的,宁可暂时不写。因此我们每卷所写的问题少而集中,但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写得详尽充实。我们的书虽带有长编性,但它是著作而非资料。为此,照录一些重要的原始材料是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带长编性了。但是,我们引用材料,甚至大量地照录原始材料,是为了通过材料把历史事件的原委说清楚。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等等,都是通过材料的叙述把它们展示出来。当然,我们不只是单纯地排比史料,不要论述。只要合乎历史实际,把握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是必要的。不过我们的论述,总是以材料为依据,用史实来说明,而且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我们的书,就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同于历史长编,所以称之为带长编性的著作,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这样的体裁是否可取?我们的书是否达到了这种体裁的要求?请读者朋友们评论吧。

要编写一部翔实的带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我们根据从前编书的经验,决定采取协作的办法。我们主要依靠北京的高等院校和军事院校来参加,而没有分散到全国去。因为写书需要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过于分散就难以进行。为了便于就编写工作中出现的学术问题及时地进行研究讨论,由主编参加,每周或每两周举行一次聚会。10多年来,坚持不懈,已经形成经常性的制度。现在参加我们写书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地方院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后勤指挥学院等军事院校的一些同志,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个别同志,总共有30多人。开始写书的时候,我们把写13卷书比作建筑一幢13层的楼房,

每一层内部的结构虽可有所不同,但13层应是一个整体,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做到各层基本上一致,符合统一的规格。后来感到这部书部头太大,参加的单位和人太多,过于统一很难做到;而且各卷不能同时并进,势必旷日持久,不易完成,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于是改变设想,把13卷比作13座建筑物,统一在一个园林里,从全局来看是统一的,就各个建筑物来说又是独立的。好比大观园里的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等一系列的庭院,每一处都独具匠心,而又互相联结,构成统一的整体——大观园,这样就更加美观和壮观。大观园是《红楼梦》作者头脑中的产物,并无完全相同的实物可寻。北海公园的五龙亭却是可供借鉴的实物。5个亭子大小有别,分开是独立的,而联在一起又大小适当,远近合宜,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要完成这样的建筑颇不容易,需要的是大建筑师。要写成与此相比拟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就更为困难,需要的是大手笔。而我们既不是大建筑师,又不是大手笔,只不过借它来作比拟,悬它来作目标罢了。根据这一新的设想,我们对全书13卷,有一个粗略的整体设计。准备每一卷都有一个书名,可以单独成书,单独印行,哪一卷先写完就先出版哪一卷。我们已把13卷书分给了各单位,以一个院校为主承担一卷。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全国各族人民大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这部历史是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的鲜血凝成的,它是那样的艰苦卓绝,那样的光辉灿烂,不用说我们这几枝拙劣的史笔,就是最伟大的作家以他如椽的彩笔,也很难写出与这段历史本身相比而毫不逊色的作品来。难道我们就此却步了吗?不!我们还是要按照乔木同志的建议,用历史长编性的

著作,力争如实地把这段历史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至此,我们深感乔木同志建议的正确。因为对我们说来,编写这段历史的长编已经够吃力了,至于著作,那是很难胜任的。为了不使大家泄气,姑名之为历史长编性的著作,如是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部美其名曰著作的历史长编,能够像《苏联国内战争史》那样,为各种专题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提供有用的资料。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也就满意了。至于写出这段历史的伟大著作,请俟诸后之来者。

1982年1月15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	1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日政略的变化	1
一、国民党内对日政策的分歧	1
二、国民政府修正内外政策	10
第二节 国防建设与整军备战	19
一、国防建设的指导原则	19
二、选择国防基地	29
三、增强国力 整军备战	35
第三节 战前国防计划的剖析	42
一、关于 1936 年国防计划大纲	42
二、关于 1937 年国防作战计划	48
第二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57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与中国政局	57
一、国际形势的演变	57
二、日本的侵华方针	61
三、七七事变前的中国政局	68
第二节 卢沟桥事变	79
一、七七事变的爆发	79
二、日本的“不扩大”方针	84
三、国民政府及北平地方当局的对策	93

四、平津沦陷	103
五、国民政府战时机构的设立	111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17
一、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谈判	117
二、中间党派的抗战主张和救亡活动	128
三、全国抗战热潮的高涨	143
四、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的召开	152
五、红军改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56
第四节 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168
一、美、英等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与支援	168
二、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与支援	174
三、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与支援	180
四、海外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182
第三章 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188
第一节 淞沪会战	188
一、八一三事变	188
二、国民政府开辟东战场的原因与得失	195
三、上海失守	207
第二节 平津沦陷后的华北战局	217
一、平汉、津浦路北段之战	217
二、平绥路作战	233
三、忻口会战与太原失守	247
第三节 八路军三大主力挺进敌后实行战略展开	267
一、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	267
二、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作战	269
三、八路军四大战略支点的建立与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	272
第四节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南京陷落	276

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276
二、南京保卫战	282
三、国民政府确立西南为战略大后方	293
第五节 新四军奔赴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02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与国民政府地方当局的 停战谈判	302
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组建与集结	308
三、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挺进敌后的指示	313
四、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	315
五、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皖东和彭雪枫游击支队 挺进豫东	318
第四章 抗战初期中国的内政外交	321
第一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321
一、战争阴影下中苏关系的改善	321
二、中苏为加强合作进行谈判	325
三、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329
第二节 陶德曼调停	334
一、国民政府对英美等国的外交努力及国联调停的失败	334
二、陶德曼调停的由来	339
三、南京沦陷前陶德曼的调停活动	341
四、南京失守后陶德曼的再次调停及其失败	346
第三节 沦陷区傀儡组织的出现	351
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出笼	351
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开张	357
三、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	362
四、南北伪政权的合流	364
第四节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与首届国民 参政会	369

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69
二、《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	382
三、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	389
四、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392
五、三青团的成立和发展	410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	425
第五章 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	441
第一节 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	441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441
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451
三、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460
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469
五、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476
六、陕甘宁边区的巩固	482
第二节 徐州会战	493
一、津浦路沿线的初期作战	493
二、临沂、滕县之战	498
三、血战台儿庄	506
四、徐州撤退	516
第三节 武汉会战与广州失守	526
一、武汉外围作战	529
二、保卫大武汉	539
三、广州失守	556
第四节 中国抗战的军事战略	560
一、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	560
二、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	565
三、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	570
后 记	575

第一章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日政略的变化

一、国民党内对日政策的分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关系实已完全成为公开的敌对关系。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正处在空前的内外交困之中。它所能控制的地域仅仅局限于苏、浙、皖、赣、豫、鄂等长江中下游数省，华北、西北、川滇黔以及华南等地都被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势力所把持。在刚刚结束的中原大战中，南京政府虽一时挫败了地方军阀及党内异己联合倒蒋的努力，使之不得不暂时屈从于一种俯首的地位，但国内真正的统一与国民党内部的均衡还远远没有形成。何况就在靠近南京政府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西等地，还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一政权及其领导的红军武装公开号召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政权，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腹大患”。南京政府虽曾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都被英勇的红军所击败。而当蒋介石正计划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之时，两广发生反蒋异变，南京政府

需要即刻筹划对两广用兵,正可谓焦头烂额,首尾不能兼顾。“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复杂环境构成了南京政府制定对日方针的基本背景条件。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三种力量的威胁,南京政府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其中最主要的手对手进行对抗,而对其他势力采取妥协手段。究竟应该把力量用在何处呢?国民党内部对此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民族危机关头应即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派势力虽然人少力薄而且备受打击,但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坚持斗争,其中如冯玉祥还冒着极大危险率领旧部开赴察哈尔前线抗日,他们的主张正如丁文江所阐述的那样:“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①然而,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主张当时并未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得到认同。

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重于剿共”,其代表人物为胡汉民等人。这一派人士虽然在反共问题上持肯定态度,但他们认为目前国难当头,中日民族矛盾已超越了国内诸多矛盾分歧,应该首先抗日。他们猛烈抨击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值兹外患凭陵、军力单薄之际,何能分此大军以驱共而灭御侮实力”?^②胡汉民甚至激动地宣称:“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③

①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台)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5页。

② “国难会议”秘书处编:《国难会议纪录》,第16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③ 《救国时报》第30期。

在如何对待中共的问题上,他们并非主张两党合作,而是主张改“剿”为“抚”,认为“且彼共产党亦为国人”,“我政府理应从事指导,恳切招宣或可易于就范,俾收一劳永逸之效”,“彼虽共党或感于我政府赴难之诚,谋国之恳切,毅然携手,共赴国难”。^①“如共产党能放弃赤化中国之主张,拥护中央抗日,则第二个对象(指剿共)自然消灭”。^②虽然这种主张的本质仍然坚持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的根本利益,但因为在反共的手段方法上与蒋介石集团存在分歧,而且持有这些主张的人又都是十足的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当时也不可能占有主导地位。

第三种意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其代表人物是南京政府内当权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江浙沪财阀为经济依赖,对中国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并在名义上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这一政治集团统治方针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与壮大本身的势力,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产生对立的时候,蒋介石就会做出违背民族根本利益的错误抉择,这也就是在1935年以前国民党的对日战略立场不断背离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源所在。

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起,蒋介石就认定活跃在他的统治地盘内、并且公开打出革命大旗,宣布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及其武装是他的死敌,必欲剿灭而后甘心。当他结束中原大战,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最大一次联合行动镇压下去之后,便将下一个目标确定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政

① “国难会议”秘书处编:《国难会议纪录》,第16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② 邹鲁:《回顾录》,第二编,第331页。

权。由于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也不可能像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那样可以共存、调和于一时，而让南京方面“缓图”。国共矛盾是南京政府面临的首要矛盾，因此，剿共便成为蒋氏的首要目标。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蒋介石曾宣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①表示了他把围剿江西与广东摆在同等重要位置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通过决议，决定对“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对广东方面则可以采用笼络手段，使广州国民政府合并于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变化又一次证明，蒋介石及其政府反共第一的原则在当时是不可更改的。

蒋介石一方面认为必须首先反共，另一方面他因抗日准备的不足与后方基地的缺乏，认定目前一旦对日作战必在很短时期内归于失败，“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②所以，目前的情况是“抗日与剿共不能并行，如抗日势必放弃剿共，是予共产党以扩大赤化之机会，抗日之军必受日军与赤军的夹击，使中国半成为苏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之中国，半成为日本殖民领导下汉奸之中国”。^③而国民党除了灭亡将一无所得。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其对日方针必然是消极的妥协的，甚至是奴性的。

^① (台)国防研究院编印：《蒋总统集》，第二册，第2096页。

^②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台)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二十五辑，第1291页。

^③ 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卷六(上)，第428—429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日本出兵东北后,蒋介石于9月20日由南昌剿共前线匆匆返回南京,召集心腹要人“会商大计”,决计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决策之机构,他要求国人“避免扩大战争”,“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1月底,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为外交部长,希望通过顾氏所主张的对日直接谈判方法来解决中日危机。顾维钧曾回忆说:“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①但是,这种直接谈判的对策无疑受到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反对,而日本政府也不愿意合作,于是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实际陷入一种听之任之的不抵抗、不交涉的放任状态。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重要演讲,他说:“九一八以来,政府对于外交早有一定之方针,即一方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领土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一方则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约,为公正道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国人要求对日绝交与宣战,反对与日谈判“群言庞杂,莫所折衷”,而他本人反对对日绝交与宣战,他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日本现在对我国“战而不宣”,若我方对日“宣而无力作战”,则徒予日本“加责任于我之机会”和“恣行无忌之口实”,并同时将“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所以今日政府之外交方针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25页。

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其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而我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①这篇演讲阐明了蒋氏这一阶段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即所谓“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蒋氏视之为“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这一“鸵鸟政策”的制定，完全是出于贯彻反共内战第一的方针，使其统治得以继续维持的需要，即一方面不因对日本侵略的退让而动摇其统治，敷衍国内人民的抗日要求，另一方面仍集中全力进行剿共内战，不因外敌入侵而有所改变。当然，其中还有深一层的隐意，即不承认日本的侵略结果及既得利益，以便为今后抗日或与日交涉留下伏笔。总而言之，蒋介石要使中日关系不致进一步恶化，以为其执行剿共政策创造条件。

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既定方针，便启用他过去的政敌、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他专程飞往杭州与汪氏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的协议，组成了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由汪负责内政外交，出面对日折俎；蒋负责军事，专主剿共内战。蒋氏此举出于两层目的：一是利用汪氏亲日派贯彻其对日妥协政策，为他“分忧”；另一层隐意还在于“推死尸过界”，拉汪一起“跳火坑”，让汪代其承担误国责任，因为他明知“四不”政策将会受到国人的反对，难以推行，自己正好一走了之。

但是，日本的对华野心并不因蒋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相反地却越发膨胀起来。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之役攻击上海，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汪氏打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旗号，宣称政府的对策是“军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11日。